在浙江省暨华东六省一市党史系统纪念建党八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代序）

梁 平 波

各位来宾、同志们：

今天，“浙江省党史系统纪念建党 80 周年学术讨论会”和“华东六省一市党史学术讨论年会”在这里隆重召开。首先，我代表中共浙江省委，向到会的各兄弟省市党史部门的领导和党史学界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向我省这次讨论会获奖论文的作者表示诚挚的祝贺。

今年 7 月 1 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纪念日。围绕建党 80 周年，以多种形式开展庆祝和纪念活动，是今年全党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党史学界和党史工作者的一项光荣任务。80 年来，为了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我们党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在世界的东方谱写了辉煌壮丽的史诗。 80 年来，党领导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正在向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大踏步迈进。

中国共产党 80年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斗争的实践检验而作出的正确选择。 80 年的风雨历程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极为宝贵的历史经验。今天，我们华东地区的党史工作者和党史学界专家教授会聚一堂，共同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一起探讨前进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其目的就在于继承宝贵财富，发扬优良传统，开辟更加辉煌的未来。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预祝这次讨论会取得圆满成功。

浙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党的一大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党的第一届中央局等重要议程，都是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红船上完成的。从此以后，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浙江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无论是在流血牺牲的战争年代，还是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表现了一种不畏艰难困苦的奋斗精神，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浙江人民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机遇、开拓进取，经济和社会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综合实力迅速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现在，我省经济总量已从 1979 年的居全国第 12 位上升至第 4 位，2000 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6030亿元，人均 13400 元 财政总收入达 658 亿元。在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引下，全省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各项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脱困“三年两目标”提前实现，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乡镇企业总体发展水平名列全国前茅；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已占经济总量的 47%。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开放型经济发展迅速。 2000 年全省进出口总额达到 278.3 亿美元，其中出口额达 194 亿美元，居全国第 4 位。城乡市场繁荣，经济活跃，去年各类商品市场年成交额达 4023 亿

元,连续 10年居全国第一。与此同时，基础设施建设也取得重大成就，科技、教育、文化等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2000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9279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4254 元，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值的 1.5 倍和 1.9 倍。

当前，浙江人民正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和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指引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争取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同兄弟省市相比，特别是同华东各兄弟省市相比，还存在着很多差距和不足，我们要虚心向兄弟省市学习，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争取搞得更好。我们也希望前来参加这次讨论会的兄弟省市的同志，多对浙江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党史工作是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工作，历来重视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研究和学习。进入新时期以来，江泽民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重视学习历史，特别是中共党史。他指出：“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江泽民同志的这一论述，对我们深刻认识研究历史的重要性和做好党史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是一笔极其重要的精神财富。学习、研究和宣传好党的历史，关系到党的巩固和发展，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胜利。党史工作者要充分认识肩负的历史责任，自觉把党史工作放在全党工作大

局中来认识，加强研究和宣传，坚持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成功经验教育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让党史工作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为此，我想借此机会，对浙江省的党史工作者提几点希望和要求：

第一，党史研究一定要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党史工作政治性很强，在研究中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总结经验教训。这既是党史工作坚持正确方向的重要保证，也是党史研究具有思想高度的基本前提。要牢固树立“党史工作无小事”的观念，讲政治、讲党性，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一定要旗帜鲜明，真正站在党的立场上，站在有利于党的事业发展的立场上，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党史研究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党史工作既面临着有利机遇，也面临着不少复杂情况。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从未停止过；国内来自“左”或右的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时起时伏；一些非法出版物歪曲党的历史、丑化革命领袖形象的‘秘闻’‘轶事’时有流传。面对这些挑战，党史工作者要保持清醒头脑，自觉增强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关于历史问题两个决议和新时期历次党代会对重大历史问题的重要结论，开展研究和宣传，真正使党史工作成为捍卫党的历史，维护党的形象的坚强卫士，成为我们事业继往开来、开拓进取的强大精神动力。

第二，党史研究要努力为现实服务。党史研究的根本使命在于指导实践、推动实践的发展。因此党史研究必须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我们党的 80 年历史，有大量的资料需要征集、整理和研究，有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和吸取。当前，我们除了要整理、研究好建国前那段历史，还要抓紧整理、研究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 20 年来的历史。邓小平同志制定的改革开放路线，使我

们国家在短短 20 年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认真总结好这一段历史，揭示其中的深刻内涵和必然规律，对于我们进一步坚定前进方向，坚定对邓小平理论的信仰，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更好地为伟大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而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党史研究一定要紧密联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紧密联系现阶段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为现实服务的方针。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史工作中政治与学术、政治与业务、研究与宣传的辩证关系，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多出政治导向正确、学术水平较高的党史成果，充分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只有这样，党史研究才能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才能不断扩大自身的社会影响，提高社会效益，使党史工作具有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第三,要坚持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是发展社会主义科学、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方针。党史工作既是政治工作，又是一门科学和文化事业。作为政治工作，必须讲政治，必须强调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作为一门科学和文化，又必须遵循其一般规律，提倡在学术研究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就是说，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坚持科学、反对迷信，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支持和鼓励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大胆探索，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在平等、融洽的气氛中民主讨论和争鸣，营造健康、生动、活泼的学术环境，以促进党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我想，我们这次讨论会就应本着这种精神进行。

第四，党史工作者要继续发扬爱岗敬业的精神。应当看到，我省党史工作队伍是一支好队伍。许多从事党史工作的同志在任务重、人手少的情况下，勤勤恳恳，加班加点地工作，拿出了大量党史成果。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下，党史工作的环境和待遇也在不断改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党史部门的工作条件相对还比较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苦。当前，党史研究的任务又比较重。我们要求从事党史工作的同志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发扬优良作风，爱岗敬业、淡泊名利、甘于清苦、乐于奉献，以良好的精神面貌开拓进取。作为组织上，要从多方面关心和爱护党史工作者，尽可能地为大家改善和创造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使党史研究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

最后，希望我省出席这次讨论会的同志多向兄弟省市的同行学习，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水平和素质，促进我省党史研究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为实现我省在新世纪的奋斗目标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

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演变的历史考察

朱　健

“知识分子”,是指“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而只是一个阶层。

在人类历史上，凡革命成功或战争胜利，经济发展或文化昌盛，都可以说是与各方面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紧密相连的。因此，认清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社会地位，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便成为各阶级和统治者事业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的学说，是由先进知识分子创造的，先进知识分子是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力量。但对于知识分子是一个阶层，还是一个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们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前后，也未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并探索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方针政策。实践证明：党确立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革命和建设就走向发展和辉煌，反之便会出现停滞甚至倒退。所以，探究党 80 年来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发展变化，对于总结历史经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一代先进知识分子集体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得以逐渐完善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近代中西方文化的撞击和融汇中，经过长期的孕育和发展，直到 1919 年五四运动时期，才一改过去的个

体或零散的状况，组织起来，并于以新知识群体的形式崛起在中国大地上。由于他们思想活跃、追求民主，自然成为当时新思想和新文化的传播者，成为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急先锋。由于他们的积极努力，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迅速传播。随着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战斗姿态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并逐渐显示出巨大的革命威力，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于 1921 年创建了中国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众所周知，最初汇聚于各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共产党发起组中的革命青年几乎都是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 13 名出席者以及当时全国仅有的 50 余名共产党员也基本是知识分子。所以说，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由“一无所有”的中国产业工人自发创立，而是由掌握了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觉组建而成。但是，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无可替代的先锋和桥梁作用，却并不是自建党之日起就为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所充分认识到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虽做出无论什么人，凡承认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经党员一人介绍，均可成为党员的正确决策，但也写进了“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①]等产生消极影响的提法。党的二大，对中国知识分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状下政治上受压迫的境遇虽有所认识，但又不恰当地称“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因此‘我们便不必到大学校、到研究会、到图书馆去”。主张组织‘群众党’[②]，强调吸收工人入党，显然要把知识分子排斥在党的群众基础之外。直到 1923 年底，持续了一年多的党内关于“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和特点”问题的大讨论之后，知识分子的革命性才逐渐被认识和肯定，党内一些人才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初步阐述有关知识分子的一些问题。

1925 年 1 月召开的党的四大，批评并纠正了以往一些否定、排斥知识分子的错误认识及政策，第一次以党的决议形式明确了：“殖民地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可造就之革命战士。”[③]并首次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平列为革命的基本力量，号召工人和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组织。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青年学生应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针。会议还把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参加革命作为党的组织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四大对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成为我党知识分子理论建设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五卅运动中青年学生革命作用的突出表现，进一步深化了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认识。 1926 年 3 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作了深刻阐述。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而那些“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小资产阶级，是革命最接近的朋友。[④]此间，瞿秋白等党的其他领导人也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论证了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进程中倾向革命的可能性、必然性和重要性。虽然这一时期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态度、政策还处于探索性阶段，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党的建设中已逐渐得到了体现。到 1927 年党的五大召开时，在全国党员总数 57967 人中，知识分子党员就有 11072 人，已占全部党员的 19.1%。这些都标志着党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的基本原则已初步形成，而且经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的开展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1927 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发动反共政变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党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政策也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以党的八七会议为标志，在批判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同时，也使“左”倾情绪得以滋生和发展。党内开始出现了不加区

别地把知识分子等同于机会主义，并从中寻找大革命失败原因和责任的极端不正常的现象。党的 11 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 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5]知识分子由此被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加以排斥、打击。党内整肃、改组、重建党组织，尤其是指导地方机关的基本方针，几乎都是以排挤知识分子为主要内容。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1928 年党的六大,虽然对“左”倾盲动主义进行了批判，但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纠正“左”的思想。1931 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中央开始的长达 4 年的统治，则把否定、排斥知识分子的极“左”错误理论及政策，推向了一个更加系统、完备的阶段，从而给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重大的损失。

在“左”倾路线统治全党的同时,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的低潮中，不断探索新的道路，并在实践中对中央的有关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抵制。周恩来在起草党的六大文件时，对党内“反知识分子”倾向曾努力加以避免和纠正。1933 年 5 月，苏区中央局《关于纠正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中错误倾向的决议》，曾严厉批评“清肃”阶级异己分子中的唯成分论的错误观念，以及党在组织发展中对知识分子的严重关门主义倾向。10 月，由毛泽东主持起草发布的《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以党的正式文件形式明确指出：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知识分子不能看作阶级成分”，尤其不能“看成一种单独的成分”。明确肯定了知识分子的“劳动者”地位，在理论上澄清了长期以来党在这一认识上存在的模糊和错误的观念。虽然这些努力大多还只是就具体的、局部性的问题进行纠偏补正，但却为几年后在遵义会议上彻底纠正“左”倾错误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1935 年 1 月召开的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

的统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党在全力纠正过去排斥和打击知识分子的“左”的关门主义倾向，逐步清除了王明等人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恶劣影响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和分析，认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知识分子具有很大的革命性和政治敏感性，或多或少地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和革命的动摇性等特点。这些分析是符合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的。随着中日矛盾不断上升，调动全国最广大民众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党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为此，党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重视和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指示和政策。12月25日党的瓦窑堡会议指出：“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可靠的同盟者。”[⑥]并宣布：一切同情于反日的知识分子，不问其过去如何，都能享受苏维埃政府的优待，给予其工作和发展的机会。正是由于党运用了科学、合理地分析知识分子的观点，才逐渐形成了党在抗日战争中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

进入抗日战争以后，党对知识分子问题更加重视，从而使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更加完善。1939年12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论述了知识分子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地位。指出了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广大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要造就自己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任务；第一次提出了“工农干部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口号。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由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各项工作中的贯彻落实，不仅极大的焕发了党领导下的各个抗日根据地中广大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和抗战积极性，也影响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科学技术、文艺、教育界人士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的决心和信心。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原理，正确认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根据新形势的需求，又提出了一系列在新解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农村和城市对待知识分子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如吸收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吸收知识分子到工厂学习管理工作；团结、改造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在改造旧有知识分子的同时，培养工农知识分子等等。这些政策，解决了广大新解放区迅猛扩大而干部奇缺的矛盾，又团结和争取了广大城市知识分子。随着解放大军的迅速推进，1949 年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又进一步明确：人民政府接管后，凡是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机关供职的人员，人民解放军一律保护其不受侵犯。中国共产党对拥护人民政府的广大国统区知识分子采取一律“包下来”的政策，深深调动了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的热情，他们为迎接解放积极贡献力量，为即将展开的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献计献策。

正是基于党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认识上的不断深化，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战争中得到了充实和完善，使之成为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导致新中国知识分子政策出现重大失误

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各项建设事业都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基于党在战争年代形成的知识分子政策，到 1955 年底，中国知识分子的队伍已达 384 万人。其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来自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在战争年代参加革命工作，但人数较少。另一部分是解放战争中接收的曾为国民党工作的大量知识分子，总数有 200 多万人。这些人属于旧中国培养的，且大多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没有受到过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这不仅阻碍着他们的进步，而且还直接影响着新中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为此，1950 年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对知识

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7]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又号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爱国人士推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强调：“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8]

党中央自 1951 年秋至 1952 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对知识分子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学习运动。几百万知识分子响应号召，积极参加政治学习，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实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这次思想改造和学习运动，效果是积极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思想中所受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影响，确立起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开始了向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伟大转变。

由于受战争年代“左”的错误思想残余的影响，以及缺乏对经济建设规律性的认识，建国初期，党在对知识分子的观念和政策上，还存在着诸如宗派主义、发展知识分子入党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倾向，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安排不当等误区，从而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为统一全党思想，调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以便向科学进军，1955 年底，党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负责的研究知识分子问题 10 人小组。接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于 1956 年 1 月召开。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次会议坚持从社会全方位来考察知识分子的根本变化，是建国后我国召开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知识分子工作盛会。

会议系统地论述了知识分子问题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理论上解决了党内长期争论的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重大问题，并严肃批评了党内一些同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

的错误倾向。此外，还强调了要有计划地吸收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争取到 1962 年使高级知识分子总数的三分之一成为党员。 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建国后十大关系时，毛泽东借鉴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促进各种学说发展的历史经验，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双百”方针对于进一步调动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于发展和繁荣我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事业，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起了有力的动员和推动作用。建国后的 7 年间我们国家在经济建设初文化事业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便是与党在这一时期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从建国开始，一直到 1956 年，我们党曾多次对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作了正确的分析。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并没有完全统一。 1956 年党的八大确定的政治路线，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但八大政治报告在确认“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的同时，却又恢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传统提法。 1956 年底到 1957 年初，波匈事件和国际风浪的发生，给了毛泽东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以消级的影响。特别是当 1957 年全党开展整风后，国内一些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表现后，党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感增强,看法上急剧“左”倾。

毛泽东在 1957 年 3 月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于 6 月正式发表，文中增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一段话。在 10 月召开的又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知识分子有 500 万人,资本家有 70 万人,加在一起,约计 600 万人,5 口之家，五六就是 3000 万人。”[9]把 500 万知识分子列入资产阶级行列，使得资产阶级总人数扩展了近 7 倍。这种对

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认识，直接影响到 1957 年反右派时对阶级力量对比的不正确估计。在这种阶级力量的估算下，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使 50 多万人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就成为必然的了。

反右派斗争之后，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思想愈益明显突出，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公正对待。正如毛泽东 1958 年 4 月 6 日在汉口的讲话中所说：“对知识分子戴上了两个帽子，封了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封了他们迷失方向。”实际上，党在 1957 年以后延续 20 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失误，最初就是从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开始的。这也导致后来的宁“左”勿右之风的盛行，使知识分子几经磨难。这不论对他们个人或国家建设事业都是极其重大的损失。由此更证明了，如何划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对每个阶级来说都是一件极为重大并影响全局的问题。

对于党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工作上的一系列失误，党中央也有所察觉。从 1958 年底起，在着手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共产风、浮夸风等急躁冒进的局部性错误的同时，对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某些失误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纠正。 1959 年 1 月，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纠正在学校党员领导干部和部分师生中存在的宁“左”勿右的思想。1961 年 7 月，刘少奇在建党 4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我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知识分子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党要继续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 1962 年 3 月，周恩来在广州为参加全国话剧、歌剧创作会议和全国科技大会的代表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这篇被认为是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报告，充分肯定了解放后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重新认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3 月 28 日，周恩来又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宣布：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 12 年的锻炼，已经发生了

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与此同时，中央对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处分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了甄别平反和摘帽子等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调整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缓和了各种社会矛盾，调动了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是中央的“左”倾指导思想并未得到彻底根除，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左”的影响甚至还在进一步发展。特别是 1962 年 9 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倾倾向，并且在后来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为一场“文化革命”,文化知识界首当其冲。《五·一六通知》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 即‘文革’的矛头就是要对准教、科、文领域的党政干部和专家学者，号召人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文革”动乱在全国高校首先掀起。运动中，更多的干部、知识分子被批判、被下放劳动，接受改造。由于对实践、劳动观念的庸俗化、绝对化而导致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极端轻视，把知识分子排斥在工人阶级、劳动者队伍之外，强迫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业务上进行“再学习”,并将其看作是‘教育革命’和‘文艺革命’的对象。从而使广大知识分子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和迫害，党和国家的文化教育科技事业受到极大的破坏和损失。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错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老同志，曾运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机会进行抵制和纠正，尽可能捍卫党的正确的教育科学路线、文艺路线和

知识分子政策，毛泽东本人后来也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纠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或缓冲了“文革”所造成的损害。四届人大以后，周恩来病情日益严重，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他面对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所造成的混乱局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先后对铁路交通、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教育、文艺以及党的工作等各方面进行整顿，使全国形势有了明显好转。这场全面整顿，唤起了全国人民、全国文化知识界的觉醒，使人们更加看清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文革”中推行极“左”路线的实质和危害，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为党在各个领域包括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开了先河，奠定了基础。

正是由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党和毛泽东没有坚持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判断，把知识分子一概地划入了资产阶级之中，进而提出改变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作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决策。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知识分子问题从根本上得到拨乱反正，社会主义建设从此走向辉煌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使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邓小平于 1977 年恢复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后，自告奋勇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决心从科教战线首先打开拨乱反正的局面。在该年 5 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而发展科技又非抓教育不可。”他还大声疾呼：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后来成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在 8 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重要讲话，对知识分子作了正确的估计和分析，强调了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性，肯定了建国后 17 年教育战线的成绩和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